

程振兴／著



鲁迅

纪念研究

1936-19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程振兴／著



鲁迅
纪念研究
1936-19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纪念研究(1936—1949)/程振兴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004-9310-5

I. ①鲁… II. ①程… III. ①鲁迅(1881~1936)—纪念文集—1936~1949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4759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刘晓红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15千字

定价 30.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大约是1980—1990年代，北京多了一批湖北餐馆，店名叫做“九头鸟”，是连锁店，中关村一带就有好几家。虽说饭菜很有特色，但我心里总有点反感。记得小时候听长辈们讲神仙鬼怪的故事，其中就有“九头鸟”，说它是“恶魔”。这个传说留在我心里，总觉得“九头鸟”不那么吉祥，可“九头鸟”的生意相当红火。后来又在电视里听到一则广告：“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居然以“九头鸟”夸耀于世，我这才意识到时代不同了，“迷信”要不得，对“九头鸟”应该有全新的理解。

振兴也是“湖北佬”，来自湖北农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她身上确实有“湖北佬”气质。我们当老师的就怕考生在考试之前来信问这问那。2004年振兴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事前从未与我联系过，来北大考完就回湖北了。我看了她的试卷，觉得她专业基础知识扎实，有思想，文字功底也好，有很好的潜质，可英语没考好。北大外语卡得很严，一旦分数线定下来，专业成绩再好也不容商量，振兴当然不能例外，我为她惋惜，就主动给她打电话，劝她考虑其他院校。振兴的回答是坚定的：明年再考，就是要上北大。2005年再考，专业课有了长进，英语也过线了，真不容易。面试时第一次见到振兴，留下的印象是朴实，有一股子拧劲。面试结束后坐在未名湖畔的石头上聊叙，才知道她的家境。振兴是在极艰苦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父母从未辅导过她的学习，也从未请过家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自学成才”，我欣赏这样的学生。

振兴也真的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入学后学习相当刻苦。学位论文的选题《鲁迅纪念研究（1936—1949）》，认真考察了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之后，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鲁迅纪念史。这个选题是与我反复商量后选定的，她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得要注重研究大家，于是很

自然地想到鲁迅，想到历史上真实的鲁迅，想到被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建构”的“鲁迅”，想到被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塑造的“鲁迅”。

我以为就鲁迅研究而言，“鲁迅纪念研究”是鲁迅研究史上一个宏大的学术命题，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鲁迅是如何被建构、被塑造成“鲁迅”的？这其中各种社会力量经历了怎样的排列组合，这一段历史呈现出何种感性面貌，都需要研究者丢开理论预设，回到历史现场，将问题“重新历史化”，追溯“鲁迅形象建构的历史起源”，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知识考古学”的工作。

虽说鲁迅纪念的研究也有一些单篇论文，但大多着眼于史料钩沉。以博士论文的规模，对鲁迅纪念进行专题研究，这还是第一次。众所周知，无论是作为纪念的种种仪式，还是作为纪念文章的这一特殊文体，虽然也都有出自“纪念”的真诚，但也不乏“为纪念而纪念”的敷衍。如何从中理出可供解读的复杂的层面，这对研究者是个严峻的考验。纪念活动虽然也各有各的特色，但有时也会流于某种“程式化”，如何从纪念活动中揭示出其潜在的意义，这又是一个难题。振兴将“鲁迅纪念史”与“鲁迅形象建构史”相联系，认为“纪念”正是一种“建构”。这个独具慧眼的发现，拓展了鲁迅研究的疆域，为鲁迅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及相关作家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重要的史料。

论文精心选择了1936年至1949年十余年间的三个“关键时段”，以三个“典型个案”为中心结构全文。围绕着“一场葬礼”、“一套全集”、“一次纪念大会”，将头绪纷繁的历史聚焦到三个“核心事件”上来。这种化繁为简的处理方式，以“点”带“面”的写作策略，既避免了论证的平面化，又避免了行文的琐碎，在“史”和“论”两方面都使论述显得更真实而细腻。

振兴有宏大的理论视野，但没有陷入抽象玄虚的理论炫技之中。她的全部论述均建立在对史料的“文本细读”之上，理论落在实处，因此多有精彩的发现。如鲁迅葬仪一章，对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建构”过程中，胡风与救国会争夺鲁迅“纪念权”的史料钩沉，新人耳目。《鲁迅全集》出版一章，对于蔡元培序言表面上一人执笔，实际上集合众意的考察，也很见功力。这种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细微入手的学术思路和写作风格，值得称赞。

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我最尊敬的孙玉石先生、王得后先生对振兴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希望振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鲁迅纪念研究一直做下

去。我希望振兴铭记老师们的厚望，拿出“湖北佬”一不服人、二不服输的倔劲来，把《鲁迅纪念研究（1936—1949）》的出版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开端，不断学习，不断奋进，在鲁迅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商金林

2010年12月26日于北大畅春园寓所

序 二

振兴的博士学位论文要正式出版了，我很高兴。为振兴，为我自己，为喜欢研究和琢磨鲁迅的人。

为振兴。是她攻读博士的成果终于可以问世，让世人分享她的研究心得；也是她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求学问的里程碑。为我自己，是多蒙振兴的导师商金林教授邀约，让我忝为他的的高足的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早早拜读了这篇很有意味的论文。这样的年代，读到一篇写鲁迅的博士学位论文，已经难得；读到一篇写得有优良学术训练，又有思想，有个性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更加难得了。在答辩会上，我就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我的激动。论文通过不到两年，经过作者的再努力，就要出版了。能不高兴吗！人就是这样，和自己有过关系的人和事，总是多一份关注，总有分享的喜乐与忧愁。为读鲁迅的人，则以为他们又多一个参考与琢磨的对象。这本书是值得阅读的，无论您研究还是不研究鲁迅。

鲁迅逝世以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什么人纪念鲁迅，说了些什么，他们所说的和鲁迅生前的言论、作为有怎样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撩人的题目。尤其是鲁迅在《死》中写出的七条“遗嘱”中，第三条斩钉截铁的叮嘱遗族：“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鲁迅不但有这样的“遗嘱”，而且在晚年的《病后杂谈》中早就拜托过他的朋友了。他说：

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

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不过是挽联做得好而已。

更激烈却中肯的意见是带普遍性的揭示：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诩，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君》）

然而，鲁迅又不是一个绝对否定纪念的人。他写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中山先生逝世已经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仅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一个纪念。然而这纪念所显示，也还是他终于永远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他也作文纪念过他的老师太炎先生。心里揣着鲁迅这样的言行，来看看振兴梳理、论述人们怎样纪念鲁迅，不是很有意味的吗？这是洞察我们中国某种人生奥秘的窗口。尤其是振兴抓住一次出殡，一部《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和一个追悼会，有人物有情节，具体生动，当作故事看，也值得翻翻这本书的。

振兴是用了大工夫的。资料的收集和梳理几乎近于“竭泽而渔”的程度。特别是她心很细，往往能够抓住关键的资料申述她的见解。如蔡元培先生撰写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序言的事。像蔡先生这样全面而精准评估鲁迅的，至今罕见。单单蔡先生的挽联：“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就值得牢记的。蔡先生是鲁迅的前辈。他能够写出这篇《序》，不仅在他熟知鲁迅，有睿智，有洞见，也在做了如振兴梳理的案头工作。

振兴年轻，知识结构比我大为优越，她在书里写出的许多见解，都令我深思。虽然有的至今并不完全理解，但我尊重她的意见。研究最可贵的品质在个人性，在独到的见解，而绝不是和“老师”扯平，重复前人的陈言。现在，我自然更要继续思索。“后生可畏”，我不能放弃思考和写作。

我唯一想提出来的，是她“拿来”的“过度阐释”的理论。她熟悉西方新的理论，能够“拿来”自然有好处。不过所谓“过度阐释”者，我是很怀疑的。因为这理论的背后，隐藏着只有自己的阐释是正确的预设。人文学科，不是算术，二二一定等于四。它能有这样的“标准答案”吗？有什么人

掌握着“唯一正确的阐释”吗？我觉得：所谓“过度阐释”和“贬损”、“歪曲”、“误读”等说法一样，都是阻碍他人研究、打击他人提出不同于自己的见解的，都是有害无益的。还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好；还是平等讨论，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好。放弃标准答案是发展自由研究、发展独立思考所必需的。

这本著作的研究只到1949年为止。而这以后的“纪念”是更加值得研究的。它的气势逼人，号令中国的威权，是真鲁迅研究者不能忘记的。所以，最后，我期待：振兴，振兴的朋友，或振兴的学生，能够继续将这个课题研究下去。

王得后

2010年12月25日星期六

导 言

—

“鲁迅纪念”是本书的题材范围。人们是在对鲁迅的持久“纪念”中不断记起鲁迅及其思想的，也是在一系列的鲁迅“纪念”中完成对鲁迅形象的建构的。在 20 世纪中国，鲁迅纪念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历时久远，其情形正如李欧梵所言：

在中国大陆，纪念鲁迅已经成了“专业”，出产了数量极丰的产品：至少有三部全集；著作有许多单行本，有些是重印的手稿；成千本的书，成万篇的文章；博物馆和陈列室；儿童读物、画册、照片、画像、速写、漫画、幻灯片、雕塑、电影、音乐（包括戏曲和舞蹈）、话剧、招贴画、书签、纪念章，不一而足。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任何其他现代作家能在整个民族范围内受到这样的殊荣。^①

对于考察“鲁迅形象的建构”这个庞大而复杂的主题而言，“鲁迅纪念”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纪念”是一种正面的阐释，其意义是肯定性的，“纪念”本身就是一种“建构”的力量。

^①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2 页。

为鲁迅纪念而作的文字，与其他所有纪念文字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往往倾向于运用公共象征性话语。鲁迅纪念文字通常也不外乎“说好话”和“说老话”两种做法，因此陈陈相因，甚至充满了陈词滥调。但在鲁迅纪念文字空洞的形式中，常常更为清晰地揭示了在不同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着力彰显的鲁迅的“意义”。纪念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往往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探寻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本书想要实现的研究目标。

鲁迅逝世后，浩如烟海的纪念文章，庄严肃穆的纪念大会，贯穿整个 20 世纪的纪念活动……已经构成鲁迅文化史^①的一个重要层面。回顾 20 世纪的鲁迅阐释史，“鲁迅纪念史”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比如，在鲁迅阐释史上，“毛泽东版鲁迅形象”^②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地位，但毛泽东关于鲁迅的经典论述，主要都是在鲁迅“纪念”中发表的：1937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论鲁迅；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搁置了一年半之久之后，特意选在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1943 年 10 月 19 日，作为鲁迅纪念文献而发表……

对鲁迅的“纪念”形成惯例，成为集体意识之一种，而且几乎成为节日。10 月 19 日，这个普通的日子，因为鲁迅的逝世，在中国现代史上被永远铭记。1940 年，在延安文艺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大会上，曾通过一系列纪念鲁迅的决议，其中一条便是“通电全国请将十月十九日定为鲁迅节”^③。虽然，后来这一通电未获准许，名义上的“鲁迅节”也未能设立，但一年一度的鲁迅纪念却告诉我们，事实上的“鲁迅节”——每年的 10 月 19 日，一直在举行各种鲁迅纪念活动。名义上不曾存在而实际上总在举行，10 月 19 日与“鲁迅节”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紧密联系，这一事实

① “鲁迅文化史”是采用葛涛《鲁迅文化史》的说法，葛涛：《鲁迅文化史》，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毛泽东版鲁迅形象：主要是指在毛泽东的鲁迅论中所形成的鲁迅形象。

③ 《延安文艺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电请全国定十月十九为鲁迅节》，1940 年 11 月 29 日《新华日报》。

本身就耐人寻味。

作为题材的“纪念”，本书考察鲁迅逝世后各种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献，以周年纪念大会、纪念文章，以及重大纪念事件为中心，试图描述和分析在鲁迅纪念中，鲁迅形象被建构的历史过程。关注“鲁迅形象”在1936—1949年间的鲁迅纪念中的呈现，也即鲁迅形象如何在“纪念”中被建构，是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

“纪念”是记忆的一种方式。在对鲁迅的纪念中，人们“记忆”鲁迅，并且“代他发言”，甚至让“鲁迅”直接参与和干涉当下的现实生活。在现代中国，鲁迅在事实上被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中国现代史上的鲁迅纪念，也往往成为凝聚“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的一种方式。

负载在“鲁迅”身上最重要的“集体记忆”，是在1930年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中，被“盖棺论定”的“民族魂”的鲁迅形象。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①。1936年鲁迅逝世之时，正是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主权受到严重威胁之际。自然而然地，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关于鲁迅的集体记忆逐渐凝定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鲁迅最终成为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民族魂”。在民族主义的视阈中，1938年《鲁迅全集》的出版也承载了“文化保卫战”的历史使命。因此，以“鲁迅纪念”为角度，可以考察在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历史时代，鲁迅如何成为一位“在文学领域承担创造‘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语）任务的知识分子”^②的历史过程。

对于鲁迅的纪念，尤其是其中的纪念大会，跟任何纪念活动一样，往往有一套严整的仪式，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形式主义风格的操作程序，鲁迅纪念仪式使用的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那么，“在纪念仪式中被记忆的究竟是什么

①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② [日] 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么?答案部分在于,一个社群被提请注意其支配性话语(master narrative)表现并在其中讲述的认同特征。”^①在1936—1949年之间的鲁迅纪念中,被提请注意的“支配性话语”,常常是在彼时彼地的社会环境中弥漫开来的“时代精神”,而且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在此过程中,鲁迅逐渐符号化为“鲁迅”,并最终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比如,在1936年鲁迅葬仪中,传达出的“抗日救亡”的时代呼声;在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寄托着的“和平民主”的政治诉求,都是当时占据主流和强势地位的“支配性话语”。因此,以“鲁迅纪念”为角度,可以考察一个时代的“支配性话语”参与到鲁迅形象建构之中的复杂过程。

除了对民族话语的承载外,“鲁迅”又是被阶级和政党塑造的形象。在阶级话语中,鲁迅是一个凝聚了抽象的“鲁迅精神”和“鲁迅传统”的“巨大的象征”,而“纪念”尤其是其中的“纪念仪式”,往往具有超越具体场合的“意义”,也即是高度的象征性,“鲁迅纪念”因此成为一种掌握对鲁迅的话语权,夺取对鲁迅这个“象征资本”的所有权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阐释经历了一个从“民族的鲁迅”到“党的鲁迅”的过程,并逐渐凸显“党的鲁迅”的形象,就是显例。以“鲁迅纪念”为视角,可以考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起源和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材料的选取上,本书语境中的“纪念”^②,取其宽泛的含义,重点考察的是1936—1949年之间,关于鲁迅的纪念活动与纪念文献。举凡一切纪念活动,包括纪念大会、纪念演出,以及纪念文章,都在本书所言“纪念”范围之内。选取“纪念”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并且将“纪念”的内涵泛化,将有关鲁迅的言说处理为广义的“纪念”,是因为在笔者看来,“纪念”是谈论鲁迅的一种独特方式,是凝聚集体记忆,形成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主要途径。

之所以选择1936—1949年之间的鲁迅纪念为论题,是考虑到这一时段

① [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② 关于“纪念”,《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三个义项:一、用事物或行动对人或事表示怀念;二、用来表示纪念的(物品);三、纪念品,也作记念。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98页。

对于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鲁迅形象的建构”，已经构成了意义相对完整的时间段落。从1936—1949年之间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的时期，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权威的时期，同时也是为建立和巩固新的生产关系而自觉建构相应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时期。鲁迅研究的最重要的历史传统与基本构架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①，因此，这一时期对于考察“鲁迅形象的建构”，具有典型意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鲁迅之死”也是“鲁迅”脱离鲁迅实体，获得象征意义的历史起点。鲁迅逝世后，中国现当代史上一年一度、持续不断的鲁迅纪念，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在“纪念鲁迅”中，存在着一个鲁迅逐渐符号化为“鲁迅”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它起源于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在随后所有的历史关头，它都要明确而周详地回溯那个时刻”^②，这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就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的逝世。

就鲁迅纪念而言，鲁迅葬仪是此后一切鲁迅纪念仪式的原型。考察鲁迅葬仪的内在构成，探究葬仪背后的人员构成和运作方式，是探索鲁迅“死后的命运”的第一个关键性环节。鲁迅逝世后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此后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一直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之中。“国难声中纪念鲁迅”，将鲁迅作为战时中国的思想与文学资源，其意义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都是空前的。

以“鲁迅纪念”为研究对象，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一年一度的对于鲁迅的纪念，尤其是其中的纪念大会，往往以其高度“仪式化”的特征，实现着充分“象征性”的功能，最为鲜明集中地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摘取和阐发的鲁迅意义的各个不同方面。“鲁迅纪念”是一种形成集体记忆、传达社会共识的方式。纪念大会的表达性和表演性，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回答了“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这个问题，凸显了不同时空背景下鲁迅的“意

①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275页。

② [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第52页。

义”。纪念大会以其一目了然、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最为密集地凝聚着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以及由此涂抹在鲁迅身上的“意义”。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也往往配合着不同时代的“主旋律”，揭示出“此时此刻”纪念鲁迅的特殊意义。

1936—1949年之间的鲁迅纪念文献浩如烟海，鲁迅纪念活动零碎分散，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地。就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些纪念活动与纪念文献都应该纳入考察的视野之中。但在具体的行文中，由于本书容量的限制以及处理问题的角度，事实上不可能，也没必要巨细无遗地以同等的笔力处理所有这些材料，企求达到一种面面俱到的研究效果。因此，在选材方法上，笔者以问题的讨论为行文线索，选取典型个案为研究对象，以鲁迅纪念中的“重大事件”来结构全书。

本书的组织和结构方式，大体上按照线性时间顺序，试图描摹出较为明晰的历史图景，在鲁迅纪念的历时考察中探究时代思潮的沧桑变迁；但由于本书论题逻辑发展的错综复杂，事实上不可能以“一根红线”贯穿。而且，笔者认为，以过于明快清晰的条理性来剪裁和切割历史文献，是反历史主义的态度。事实上，鲁迅纪念的丰富层面和复杂内涵也不能为单一的、线性发展的历史叙述所呈现。因此，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为了论题的集中和讨论的方便，本书并不拘泥于严格的历时性描述，而是多有共时性呈现，甚至时空交错。

笔者认为，选择“鲁迅纪念研究”这个题目，考察鲁迅纪念相关活动和文章，至少有如下学术意义：

首先，“鲁迅纪念史”是“鲁迅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有研究者在谈到鲁迅文化史时所说，对“鲁迅纪念”的研究，其实“类似于对鲁迅进行考古挖掘，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是如何成为具有众多象征含义的文化符号‘鲁迅’的，人们特别是政治家是如何结合时代因素对鲁迅进行新的阐发与诠释的”^①，这是一个从“鲁迅本体”出发，观察“鲁迅本体”的不同“鲁

^① 葛涛：《鲁迅文化史》，第325页。

迅镜像”，进而考察“鲁迅形象的建构”的历史过程。

其次，是对时代精神的考察。诚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总是立足于当下来阐发“鲁迅”的意义的。唤醒记忆中的鲁迅形象，往往是为了应对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纪念鲁迅常常是为了论证现实的合理性，或者针砭现实中的弊端，“鲁迅”也因此常被视为“单纯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翻阅大量的鲁迅纪念文献，会发现人们“纪念鲁迅”往往是为了“干涉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时候，主要彰显鲁迅“民族魂”的形象；在进行战争动员的时代，着力凸显鲁迅的“战士”形象；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重点强化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战后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时代，鲁迅又由“民族魂”变成了“民主之魂”……在鲁迅纪念中呈现出来的鲁迅形象的变迁，紧密结合时事政治的发展变化，有时甚至与政治时局具有“同声相应”的紧密联系。所以，考察从1936—1949年之间，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时代精神的流变，鲁迅纪念的研究，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最后，是对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考察。1936—1949年之间，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乱世，“国难声中说鲁迅”，自然别有幽怀和寄托，可谓“有深意存焉”。人们在“言说鲁迅”的同时，其实也在进行着“自我表达”；借助“谈论鲁迅”这个话题，在申说“我之鲁迅观”的同时，现代知识分子也在“流露自我”。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怎样谈论鲁迅，也便怎样看待自我。在“纪念鲁迅”的各种公开场合，人们谈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同时，也在隐秘地、顽强地进行着自我表达。鲁迅纪念的仪式性和表演性，固然造成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集体大合唱”，但鲁迅纪念的表达性和重复性，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又必然折射出纪念者自我的精神侧面。所以，对鲁迅纪念的研究，也是探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一条便利可行的途径。

纪念鲁迅其实是唤醒并凝聚集体记忆的一种方式，对于鲁迅的纪念，参与着时代的总体精神构成。因此，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从“鲁迅纪念研究”这个独特的角度，能够描摹历史的真实图景，重现时代的精神氛围。

二

在方法论上,本书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研究方法,将所有鲁迅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献视为对鲁迅的阐释,视为一种“象征性的集体文本”。笔者认为,在总体上,作为一个“政治话题”的鲁迅纪念,是一个对“鲁迅本体”进行“过度诠释”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诠释者势必要将“鲁迅”这个文本“捶打成符合自己要求的形状”。描述“鲁迅”在诠释过程中的形象变迁,并分析这些阐释活动背后的“阐释者意图”,以及这些意图与“时代精神”的对应关系,是本书想要实现的研究目标。在理论立场上,笔者虽然认为对鲁迅的“实用性解读”和“工具性利用”,是一种“过度诠释”,但笔者同样认同乔纳森·卡勒的说法,认为“过度诠释”自有其意义:“正如大多数智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它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①当然,在鲁迅纪念中,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过度诠释”以其极端化的形式,表达的依然是一种“共识”,而非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的个体意识。

在具体的行文中,本书将所有鲁迅纪念视为一种“象征性的集体文本”,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在具体详尽的微观文本解读中,探寻“文本的意图”。

在结构方法和写作理念上,本书主要受到“百年中国文学总系”^②的启发,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诚如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的后记中所言,“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设想“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不是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是突入‘一点’而观‘全貌’”,这样能够“更集中,更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与可操作性,可以把容易为‘大文学史’所忽略(或省略)的历史细节(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原生形态的细节)纳入视野”,这种写作方

^① 乔纳森·卡勒:《为“过度诠释”一辩》,〔意〕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9页。

^②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谢冕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在1998年和2002年出版。